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青年思想引领

主持人 张 瑜[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快速变迁,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成长产生深刻影响。当前,青年群体走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的社会前列,他们在创造新文化新业态新价值的同时,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把握智能社会发展趋势下青年思想引领的主动权,一方面,要立足智能社会崛起的时代背景,分析人工智能所造成的新工具、新环境以及新生态对社会思想文化带来的发展变化,研究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规律遵循,围绕智能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方法理论和管理理论进行研究探索。另一方面,要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的实践前沿,抓住青年文化发展、社会思潮变迁、教育范式转变的新趋势,围绕青年思想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展开研究,把握发展规律,破解实践难题,提升理论自觉。《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机制、风险及其应对》从信息方式变革、交往关系调整、社会环境变迁的视角分析青年价值观变化及潜在风险,作出技术向善、制度牵引、智教融合、主体培育的对策建议。《青年热衷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成因及对策》则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这一热现象折射出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提出构建政府规范主导、平台责任践行、教育深度赋能、社会积极引领、青年自觉成长的协同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 机制、风险及其应对

■ 张 瑜 沐 乐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青年的生活场域,对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复杂影响。它通过引发信息方式变革拓展青年价值认知,通过引

收稿日期:2025-05-15

作者简介:张 瑜,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沐 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思政课教师网络育人能力提升研究”(课题编号:23JDSZKZ09)、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研究”(课题编号:22JJD710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知识革命重构青年价值观形成的知识基础,通过引发交往关系调整改变青年价值体验,通过引发社会环境变迁倒逼青年价值调适。但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为青年价值观带来潜在风险,体现为生成式信息供给伴生青年价值认知困顿风险,依赖性技术运用潜藏青年主体性消解风险,失范性交互行为叠加青年价值取向偏离风险,智能场域特性隐含青年价值观畸变风险。对此,应通过引导技术向善,营造和谐向上的技术生态;通过发挥制度牵引,构建全面有效的治理框架;通过促进智教融合,完善青年价值观培育体系;通过激发主体自觉,提升青年的技术适应素养。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 青年价值观 主体性 信息技术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嵌入社会生活各领域,成为智能时代技术革命的里程碑。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专注于利用大型数据进行机器学习,模仿人类语言方式,自动创建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新内容,并通过跨模态信息融合与深度逻辑推理,实现了从工具性回应到认知性对话的跨越。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低门槛特性“飞入寻常百姓家”。据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低龄用户是其主要使用群体,30岁以下使用者占比达54.8%^[1]。在青年使用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凭借其技术特性,深度重塑青年的认知图式与价值坐标。“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探究新兴技术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学界观点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双向交互的人机关系“促使青年以系统动态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二元世界’的存在和发展”^[3]。另一方面,有学者作出“智能技术的异化使青年在网络上越来越失去个体意志和个体自由”等风险研判^[4]。在技术对价值观影响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观引领的同时,“技术对于价值引领活动的强烈自反性力量”会放大价值悬置、价值疏离与价值脱序的风险^[5]。有学者探究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双面影响,指出认同缺陷“本质在于交互过程的不足所带来的偏差”^[6]。其中,新兴技术与青年主体性问题备受关注。有学者从哲学角度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生成性’和‘类人性’模糊了教育中人的‘生成’本质”,遮蔽了教育活动中“人”的主体性^[7];另有学者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化规训、算法认知替代、技术中介化等逻辑,导致教育对象主体信念弱化、思维惰化、感知虚化、责任意识淡化,进而引发多重伦理风险^[8]。鉴于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系统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机制,全面剖析潜藏的风险隐患,并探索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对充分发挥新兴技术在青年价值观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至关重要。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机制

价值观是人对客观事物价值、意义与行为准则的根本观点,其形成既依赖主体的内在条件,

也受到外在力量经由主客观中介因素的塑造。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的颠覆性技术,通过变革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重构知识体系、调整交往关系以及推动社会环境变迁等路径,对青年价值观产生系统性影响。可见,技术作为变革的源头,引发一系列中介因素的变化,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彼此作用,最终传导至个体的观念层面。

(一)信息之维:技术驱动下的信息方式变革拓展青年的价值认知

当前,“信息是所有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9]。作为社会高效运转的重要资源,信息已成为青年构建价值认知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海量信息储备、灵活性信息叙事方式与即时性信息回应特征,对青年价值观形成“技术—信息—认知”的影响传导链条。其一,海量信息储备延展青年价值认知边界。青年价值观需要在接收、理解与甄别信息的过程中形成,丰富的信息量是青年价值认知的基础,使其不断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在认知碰撞中形成独特价值体系。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分布式储存架构与超大规模语言模型,构建庞大的“信息流”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能够满足青年多元化的信息获取需求,更能够通过多模态信息呈现形式,打破传统单一信息源的垄断,使青年逐步形成跨模态认知模式。此外,信息规模效应为青年价值探索提供丰富资源,使其在反复提问与平台比较的多重认知中,实现认知边界的延展,并通过消除认知冗余逐步找到价值“交集”。其二,灵活性信息叙事方式促进青年价值转化。青年价值观受各类信息影响,但面对不同的信息叙事方式,青年对信息的认知与接纳程度是不同的,信息向青年价值观转化的效果也会出现差异。对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组织、编排与讲述策略具有独特性,能够促进青年的价值观转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解析式”的叙事方式,将复杂价值议题转化为结构化思考框架,使青年迅速抓住问题要点,形成价值辨析的“元认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适应性”的叙事方式,能够识别青年话语特征,动态调整文本回应风格,“以契合青年心理习惯和实际生活的创造性传播来满足青年的价值需要”^[10]。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理性内核+感性表达”的叙事方式,能够借助生动化、情感化、故事化的叙述风格阐释抽象的价值问题,更易激发青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其三,即时性信息回应特征激发青年价值探索主动性。对青年群体而言,以自我思考为引领,并主动接触外界复杂的价值问题,能够使其在自我审视中实现价值观的优化。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扮演青年信息检索的常态化“陪伴者”,是青年开展价值探索的重要途径。即时性回应机制不仅打破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时空阻隔,及时解答青年的价值困惑,使其知晓自身想法的优劣,避免出现认知悬置的情况,更能够提升青年因获得即时信息回馈带来的成就感,激发青年的持续求知欲望,使其逐渐将价值探索转化为自身需求,养成主动建构价值体系的习惯。

(二)知识之维:技术赋能下的内容生成重构青年价值观形成的知识基础

知识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知识的积累与更新直接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生成式人工智能突破传统知识载体的物理局限,将人类文明成果浓缩为可即时调用的数字资源。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知识生产主体的扩展、知识生产过程的升级与知识形态的多模态化,对青年价值观产生“技术—知识—价值”的连锁影响。其一,知识生产主体的扩展增强青年价值认知

结构的复合性。作为知识生产的新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打破了人类对知识的垄断,其生成的知识内容“本质上是人类既有经验与机器智能深度融合的产物”^[11],是人脑与机器的混合“劳作”。在知识生产日益走向人机融合的过程中,青年不仅逐步适应了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人机互补的价值认知;此外,通过用户与界面的交互轨迹,“人机双方不仅能够实现对话题、背景信息以及先前对话内容的共同理解,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由人类牵引的人机共享的心理状态和知识”^[12]。因此,在人机协同的过程中,青年不仅完善了个人的价值认知结构,也不断实现了对系统进化的“反哺”。其二,知识生产过程的升级强化青年价值判断的逻辑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提高了知识生产效率,还实现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升级。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知识加工与整合方面优势明显,其通过摘要生成、思维导读、知识关联捕捉等功能,“有效促进全球知识的跨领域整合、交叉分析,帮助发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潜在联系,有机会产生或激发出新的知识”^[13],这不仅为青年的价值判断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根据,也使青年注重构建知识谱系,养成系统性的思考习惯。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生产过程的可视化增强,以当前“深度思考”功能为例,该功能向青年用户呈现问题拆解、分析、整合、回应的多步推理过程,使青年能够直观了解大模型的“思维链”,潜移默化地使青年在价值判断时注重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养成探究事物间本质关联的思考习惯。其三,知识形态的多模态化提升青年价值感知的立体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打破了单一文本表征知识的局限,促进了知识的多模态转换。这一转换并非简单的形式变革,而是对知识理解维度的拓展,赋予知识更全面的阐释路径与更强的吸引力,从而激发了青年自主价值探索的动力。同时,知识形态的多模态化还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实践体验,使青年对价值问题的感知更为直接和立体。例如,通过对伦理困境的虚拟模拟,青年可以身临其境地置身于价值冲突的具体场景,并在“沉浸”且“互动”的虚拟现实情境中,提升价值选择与伦理决策的能力。这种立体性的价值感知,以显隐结合的方式持续塑造青年的价值观念。

(三)交往之维:技术深度嵌入的社会交往实践改变青年的价值体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4]。交往活动不仅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价值观形成的实践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为青年的社会交往开辟了全新场域。青年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互动过程,呈现出对话式交往模式、多元性交往主体、情感性交往取向等特征,新颖的交往实践深刻改变了青年的价值体验。其一,对话式交往模式构建青年价值交流新情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问答方式的模拟,本质是在效仿人类的交往方式。它超越了“搜索—回应”模式的问答平台,而成了一个生动且极具耐心的交往对象。该对象深度嵌入青年日常生活,拥有日常生活化的交流特质,构建了兼具技术与人性的交往界面,精准契合了青年对人机互动的“进阶式”期待。在这种交往模式下,全新的价值交流情境应运而生。这一情境拥有平等的对话氛围,青年不再被动接受价值信息,也不再针对问题仅开展一次性交流,而是能够在得到机器反馈后与其反复交流,从而提升价值交流的深度。可见,“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15],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构建的交流情境,已然成为青年深化价值交往的重要力量。其二,多元性交往主体拓展青年价值体验新层

次。“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6],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支持下,虚拟偶像、AI聊天机器人等具有人格化特征的智能体持续涌现,并逐步融入青年的交往结构。这拓宽了青年社会交往的主体范畴,由此延展了青年的价值体验层次。在与智能时代多元主体的交往时,青年可以接触多元文化,在形成开放、包容、尊重等价值态度的同时,也在比较的视野中建立起复杂立体的价值参考系。此外,青年通过在不同交往角色之间的转换,收获更加丰富的价值体验,这一过程使青年在视野的开拓性与价值的流动性中,不断探寻观念的平衡定位。其三,情感性交往取向塑造青年价值认同新机制。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青年开辟了情感表达的新渠道。同时,它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精准捕捉青年用户情感需求,并模拟人类情感回应风格,为青年提供新型情感支持。这种情感性的人机交往取向,重塑了青年价值认同的机制,也暴露出技术情感支持的双重“面孔”。一方面,技术赋能使青年收获更丰富的情感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的积极交往特质,也逐渐内化为青年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部分青年过度依赖技术性情感供给,这将削弱他们对现实复杂情感的感知与理解能力,长期沉浸于标准化、低冲突的情感交互,易使青年价值认同陷入虚拟满足与现实疏离的矛盾,影响其对社会关系的深层认知,不利于形成稳定成熟的价值观念。

(四)环境之维:技术演进下的社会变迁引发青年的价值调适

技术演进作为社会存在的关键要素,有力推动了社会环境的变迁,改变着社会生产模式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观念嬗变,作用于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并触发青年价值体系的相应变动。然而,青年群体并非处于被动地位,而是能动地“回应”这些变化,展现出与社会观念变迁的有机互动。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在这一动态进程中影响青年价值体系,并为青年提供价值调适的契机。其一,就业结构嬗变重塑青年职业价值取向。“每一个活动领域都相应存在着一种由总的价值观具体化而形成的价值观念”^[17],可见,技术演进能够改变具体领域的运作逻辑,并引发该领域价值观的变迁。其中,与青年群体紧密相关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各行各业,促使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人力资本评价发生转变,这使青年的生存策略与职业价值观面临调整。当下,传统职业结构面临革新,新兴职业与岗位不断涌现,创新性、情感性、决策性事务的价值愈发突显,“学历本位”的惯性思维正在被“创新本位”取代。青年逐步认识到,个人的知识结构与技能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在技术浪潮中持续彰显个人价值,这既是对青年价值观念结构的优化,也有助于其在数字时代找到发展机遇。其二,生活方式智能化转型激活青年价值情感。情感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事物相连接的“润滑剂”,激发积极的价值情感,是青年正确价值观生成的必要条件。自ChatGPT问世以来,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呈现“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OpenAI相继推出GPT-4、GPT-4 Turbo、GPT-4o, Gemini系列、Claude系列、Llama系列等先后涌现,Notion AI、MidJourney、Runway等垂直工具也竞相爆发。2025年初,我国DeepSeek模型的“爆火出圈”,彰显出技术自主创新战略价值。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编织”出智能生活新图景,青年面临人机共处常态化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机交互实践能够增强青年的感性认知能

力,并有效激活青年的价值情感,使其深入思考客观事物的价值与意义,对主流价值观也更易“由感性的情感认同上升为理性的意义认同”^[18]。其三,技术伦理困境催生青年价值思辨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其深度应用也衍生出一系列诸如数据滥用、算法偏见、隐私安全、深度伪造等伦理困境。这些问题通过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系列价值问题,也为青年提供了批判性的价值议题,推动青年从技术的接受者与操作者上升为伦理思考者。青年伦理观念的完善不仅是价值观拓展的重要维度,也使青年更为审慎地对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逐步形成负责任的应用态度。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潜在风险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突变性涌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类社会的可能性,也提升了青年学习生活的“想象力”。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忧,这种风险彰显了技术逻辑与意义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一)生成式信息供给伴生青年价值认知困顿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宛如“百科全书”,无论输入端问题如何,输出端总能给出“体面”答案。然而,尽管内容生产能力强大,生成式人工智能仍存在信息波动、信息茧房、信息失真等风险因素,导致青年获取信息时可能对“何为真实”“何为正确”“何为唯一解”等问题产生怀疑。其一,信息波动易引发青年认知迷茫。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是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分析数据关联性,以概率重组为运行机理,内容生成具有不稳定性,输入相同或相似的指令,可能得到价值导向不尽相同的结果,且“这些系统的学习能力越强,其行为就越难预测”^[19]。信息内容不统一的背后,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价值观与伦理准则的不稳定。对此,有学者持乐观态度,认为系统的不确定性能够促进人机价值对齐,进而“维护人机协作的信任基础”^[20]。该观点聚焦技术的自我更新,然而,对于价值观尚未完善的青年群体,这种不确定性与其既往接受的教育中知识的确定性相悖,同时,海量庞杂的信息易使青年认知“超载”,冲击其原本稳定的认知体系,致使其对事物价值产生迷茫。尽管这种迷茫是探索价值对齐的必要阶段,但若缺乏正确引导,青年将难以构建系统性认知框架,甚至产生认知焦虑。其二,信息茧房易导致青年视野窄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用户导向型工具,能够借助设定标签进行个性化回应,且在用户长期使用过程中呈现“专属化”特征。对青年用户而言,“专属机器”尽管更贴合其信息需求,但也极易将其禁锢于封闭的信息环境之中。一方面,机器易出现“投其所好”式的内容回馈,忽视对青年用户指令背后价值取向的甄别。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即时数据训练能力,用户对问题的主观理解会对输出结果产生“扰动”,青年向其提问时极易产生“循环论证”,从而陷入自问自答的困境。更为严峻的是,青年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信息时,往往同时面临信息泛滥与信息茧房的双重极端,这极易引发其自我信念“拉扯”。其三,信息失真易冲击青年主流价值认同。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信息并非“无源之水”,而是高度依赖网络大数据。若数据本身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存疑,以及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部分网

络信息存在价值歧视与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极易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中介,使青年因信息失真而对现实世界产生怀疑,甚至带来严重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人工智能并非意识形态的制造者,而是偏见的继承者”^[21]。当前,网络空间西方价值观渗透日益猖獗,其存在形式与表达方式日渐隐晦,生成式人工智能虽具备类人思维,却不具备较强的意识形态批判能力,对此类虚假信息往往“防不胜防”。经此,潜移默化接触到“毒信息”的青年自以为实现了信息自由,实则被错误观念与技术的耦合裹挟,长此以往将会削弱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甚至使其走向价值相对主义的错误道路。

(二)依赖性技术运用潜藏青年主体性消解风险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青年学习生活深度融合,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存在青年对技术过度依赖的问题。总体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是一种‘高级复制’,不是人的‘创造’”^[22],当“生成”的意义被放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的技术支配力将压抑青年的本质力量,从而消解青年的主体性。其一,技术依赖使青年面临思考能力退化的危机。思考能力是青年开展价值辨析的前提,帮助青年突破表层认知局限,构建主体的、理性的、稳定的意义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能够通过“认知外包”机制拓展认知能力,但外部信息输入“需要通过个体头脑的信息加工和整合,使其与内部认知网络相匹配并进一步被转化为新的知识内容”^[23]。因此,如果青年过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会削弱技术赋能效应,使青年思考价值问题时首先想到求助工具而非独立思考,长此以往,则难以形成独到的价值认知。此外,技术依赖还可能导致青年思考过程出现机械化倾向,这种倾向不仅使青年的思考过程简化为“输入指令—等待结果—拷贝内容”,还使这一过程从推导式(根据问题推导结论)变成验证式(先有结论再去思考),结论的“先入为主”将削弱其深入问题本质的思维能力。其二,技术依赖使青年面临奋斗意识弱化的危机。奋斗不仅是价值理念转化为现实追求的驱动力,更是社会主流价值导向之一。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提供决策支持、完成重复性工作等方面能够提升青年工作效率,有效纾解其工作压力,但如果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取代其在学业与工作中的必要努力。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青年形成“捷径思维”,忽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忽视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责任担当的培养。另一方面,可能导致青年产生回避心理,削弱其应对困难时的韧性与创造力,也使其无法体验到通过自身努力完成目标的成就感。这种以“效率”替代“成长”的追求,易使青年逐步忽视奋斗本身的意义,甚至催生出功利主义的价值倾向。其三,技术依赖使青年面临人文精神淡化的危机。人文精神以文化遗产与人性关怀中对“真、善、美”的追求为内核,是青年正确价值观得以涵养的重要精神根基。然而,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的强大功能,部分青年却产生“技术至上”的观念,认为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各类复杂难题都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框架内找到答案,甚至在情感表达与审美活动中,他们也极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而不是主动唤起自我的情感共鸣。这种观念无异于将“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片面放大了技术的实用意义,忽视了技术背后的人文关怀等价值意涵。此时,“青年价值观的养成过程被‘降格’为技术运作的部分程序”^[24],这种既定的程序感与人文精神的包容性背道而驰,易导致青年对社

会、历史、文化与人性缺乏深层理解。

（三）失范性交互行为叠加青年价值取向偏离风险

网络空间存在诸多失范行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其技术特性不仅进一步刺激了用户的负面心理,更为人机交互行为失范创造了技术条件,从而放大了网络空间的负面效应。在技术的加持下,网络泛娱乐化、道德越界乃至违法犯罪行为不断涌现,无论青年是目睹还是参与,都为其价值观念偏离主流导向埋下隐患。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泛娱乐化行为,存在削弱青年价值深度的潜在隐忧。在视觉主导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图像生成与短视频二次创作优势突显,是网络娱乐内容生产、传播及平台建设的高效工具。追求感官刺激是青年的天性,但若长期沉浸在这类泛娱乐化的网络氛围中,青年的价值评判可能趋于肤浅化,并忽视追求真正拥有深刻内涵的网络内容。同时,针对社会价值议题,大量娱乐化解读替代理性分析,挤压了青年严肃讨论主流议题的空间。此外,部分青年受猎奇心理驱动,借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魔改故事、模拟极端事件等“超现实”内容,满足对非常规信息的探索欲。部分青年自以为实现创作自由,殊不知已然成为流量社会的“帮凶”。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下的道德越界行为,存在模糊青年价值边界的风险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求必应”的特性与匿名化特征,滋生出不同程度的道德越界行为,极易使青年形成错误的价值评价与道德选择。据最新统计,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者职业结构中,学生以37.8%占据首位^[25]。然而,在技术赋能学习生活时,部分大学生打破学业规范,运用“创意写作”“阅读分析”等功能,完成本该独立思考的学业任务。部分大学生忽视学术诚信,运用智能改写与润色等功能,出现直接抄袭、间接拼贴、深度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部分大学生试图绕过安全限制,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伦理边界,如令其回答敏感性问题或违规内容,或利用其生成伪科学论断。如果放任这些行为,可能会扭曲青年的知识与价值体系,甚至助长其对主流价值观的解构态度。其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推下的违法犯罪行为,存在侵蚀青年价值底线的严重隐患。生成式人工智能开放性的技术特质,显著降低了虚假信息的产出门槛,甚至演变为新型违法犯罪的“孵化器”。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其内容输出、深度合成等功能,实施规模化新闻造假、舆论操纵等违法活动,更有犯罪分子通过AI换脸、语音克隆等技术,实施精准化网络电信诈骗。此类犯罪借助技术“以假乱真”,信息溯源难度极大,不仅会对青年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更系统性侵蚀青年的价值认知体系。当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技术能力突破法律边界而未得到有效规制,青年易形成“技术赋权”与“法律失效”的错误价值关联,进而动摇其法治信仰根基,并对社会公平、正义、诚信等主流价值观产生怀疑。长期接触此类违法犯罪现象,还可能导致青年模糊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降低青年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心理防线,甚至诱导青年产生越轨行为。

（四）智能场域特性隐含青年价值观畸变风险

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复合型的“养料”。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的智能场域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机制之间潜藏内在张力。若缺乏正向引导,将使青年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出现结构性断裂,并呈现“畸形生长”的态势。其一,智能场域的“速食性”特征,与

青年价值观的渐进形成规律存在内在冲突。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长期沉淀中逐步完善。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营造出充满“速食文化”的场域,其快速响应机制证明“时间成为技术可以战胜的对手”^[26],体现技术统治文化对社会节奏的“提速”。知识易得性的增强,可能助长青年对“快速满足”的追求,使其缺乏“思考—质疑—验证—习得—深化”的价值自觉过程,从而丧失探索真理的耐心。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式”的回馈风格虽能迅速提炼要点,但却将复杂价值问题简化为要素罗列,简化了青年价值判断过程中的思维锻炼,从而可能限制其深层价值思维的形成。其二,智能场域的“虚拟性”特征,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现实根基造成强力冲击。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以现实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为根本支撑。青年的价值认知源于社会实践,其对规则制度的认同,需要在真实社会互动的冲突、反思与调适中确立,即使从虚拟环境中汲取的价值认知,也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环境,本质是脱离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其“可以模拟人的某些自然属性,但难以模拟人的社会关系属性”^[27],更难以模拟青年价值观发展不可避免的“偶然要素”,如促使青年思想转折的重大生活事件、激发青年深度思辨的两难情境、引发青年情感触动却不可复现的独特场景等。可见,青年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互动的实质是一种仿真体验,难以为价值观发展提供根本动力。长期沉浸于虚拟实践,还可能弱化青年的现实支持网络,削弱其价值观形成的现实根基。其三,智能场域的“拟主体性”特征,对主流价值观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青年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主流教育者的积极介入。当下,“交互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接近一种语言主体或认知主体”^[28],具有“拟主体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生成供青年自主探索与验证的知识内容,还能够实现主体间的情感交互。这激发了青年价值观养成的主体性,却冲击了教育者的主导地位。这并不代表教育者的能力不足,而是因其存在技术短板,对青年知识需求的捕捉具有滞后性。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复制教育者的人文关怀,无法替代教育者肢体、眼神、同理心等对青年的积极影响,其“通过数据分析和情感计算生成的‘标准化共情’,容易割裂情感表达与内在价值的有机联系”^[29]。此外,针对某些价值议题,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主流教育观点相悖,易使青年陷入价值“撕扯”的境地。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下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应对策略

新兴技术的发展总是伴随“双刃剑”效应,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既要充分抓住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观形成的难得契机,又要极力克服这一过程中暗藏的风险挑战。培育青年价值观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全方位关注技术何从、制度何用、教育何为、青年何处等问题。

(一)引导技术向善,营造和谐向上的技术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要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增进人类社会共同福祉,也要致力于促进个体全面发展,激发人的本质力量。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尚处

于发展“井口”期,应通过不断优化算法模型,为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构建良好的技术环境。其一,构建主流算法,防范系统性意识形态风险。“人工智能绝非价值中立的技术手段,而是内容与主体勾连互通的权力中介”^[30],妥善应对技术异化,关键在于重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旨归,确保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高度对齐。在构建主流算法时,应注重打造全过程框架,从数据源提取、数据筛选与训练,到模型设计与生成、投入应用等各个环节,都应规制算法模型的资本逻辑,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抵御工具理性对价值涵养功能的消解,避免青年产生与现实教育相悖的价值不协调感。其二,提升算法透明,纠正技术逻辑的价值偏倚。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存在算法偏见,技术逻辑的“理想主义”与价值观输出的“现实主义”之间存在张力。对此,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透明化进程,如公开算法框架、关键参数、数据处理流程等,能够“解锁”技术黑箱,使青年了解其工作原理与决策依据等“内幕”,从而保持更加客观理性的认识。增强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还能发挥我国庞大市场规模的优势,以用户监督带动用户信任,减少歧视性观念以技术逻辑对青年的负面渗透。其三,优化关键词识别,强化内容生成的自我纠偏。促进关键词语料库扩充与识别技术升级,有助于技术通过自我学习实现自我约束。对此,应坚持机器学习与人工校准相结合,对存在异议的关键词进行人工校验,并设计对抗性样本进行识别训练;应坚持注入正能量语义基因的同时,也要对政治错误类、戏谑性、无意义等纠偏类关键词保持敏感性,通过设置传播屏障进行内容屏蔽与交互终止;应积极设计“青年关键词”,通过文本迅速“识破”用户青年身份,并通过捕捉情感类关键词,把握青年即时交互状态,增强文本回馈的针对性。其四,推进技术评估,统筹技术迭代与伦理审查。营造良好的技术生态,不能放任技术“野蛮生长”,而应构建常态化的技术评估机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超越性,不能触碰社会道德伦理的“红线”,尤其是涉及对青年价值观影响的问题,应邀请多领域专家进行技术评估,精准“划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青年价值观培育的合理边界,并及时“回收”可能对青年成长产生误导和危害的不当赋权,确保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同频共振。

(二)发挥制度牵引,构建全面有效的治理框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31],并特别强调要“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机制”^[32]。可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不仅依赖技术进步,更要以制度保障规范新兴技术的合理运用,发挥其在引导青年形成正确价值观方面的积极功效。其一,完善法规体系,实现全周期的制度覆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要求法规体系覆盖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及市场推广全过程,明确技术应用责任边界,健全违法行为惩处机制,以法治手段降低技术的价值风险。近年来,国家网信办联合多部门发布一系列倡议类文件:2023年8月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同年10月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及2025年3月发布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都标志着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法治路径探索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其二,健全行业政策,规范技术商业应用导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应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原则。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跟踪技术发展最新形势,以前瞻性视野制定行

业标准。在应用导向上,应侧重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优质服务,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促进消费者全面发展。针对与青年网络亚文化活动紧密相关的行业主体,可推行“年龄分层+内容适配”双轨制应用模式,强化正向激励机制与黑名单制度建设,重点整治成瘾性交互设计、价值观极化推送等“痛点”问题。其三,突破单一监管,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单一监管模式难以应对复杂的治理问题,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力量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政府应主导政策制定、资源供给与监督执行;企业需加强内部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应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化解利益冲突;媒体应净化自身生态,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青年价值观培育问题,还要重视家庭与学校的作用,深入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的实际影响,从而推动治理变革。同时,应促进各主体责任对齐并凝聚价值共识,实现治理工作的有效衔接。其四,强化制度创新,动态调整技术治理框架。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应保持治理框架的弹性与适应性,增强制度引领的前瞻性与预见性。对此,应依托专项攻关研究赋能制度设计创新,既要全面剖析技术应用现状,也要深入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既要宏观审视技术对社会的深远影响,也要微观关注其对青年群体等特定对象的具体影响。由此,要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制度引领的“韧性”,加强技术治理与制度创新的互嵌融合。

(三)促进智教融合,完善青年价值观培育体系

青年价值观的塑造,离不开主流教育的积极引导。在智能时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33],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价值观有所冲击,但绝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使新兴技术成为教育的有力辅助工具,从而“弥合”技术与观念的裂痕。对此,“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教育的生命属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实践的价值取向所作出的本质规定”^[34],“善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对青年价值观培育体系的完善与升级。其一,挖掘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青年价值观培育中的积极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用,不仅要更新教育理念,更要打造价值观智慧教育模式,构建智能化的价值观培育环境。在此过程中,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应用,成为至关重要的议题。在课堂教学中,应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虚拟场景创建、教学素材生成、互动对话模拟等,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参与感与沉浸度;在课后,应为学生提供恰当的“使用指南”,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起到个性化辅导与全天候陪伴的作用,提升学生自适应学习能力。其二,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青年价值观教育评价体系。在技术冲击下,传统教育评价体系逐步显现“力不从心”的疲态,如学生作业存在“真假难辨”或“真假参半”情况,既难以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无法判定学生的真实收获与教学的实际效果。因此,应调整青年价值观教育评价体系,使其兼顾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实运用与教育评价的有效性。具体而言,应注重过程性评价,规避“一篇作业定乾坤”的评价方式,削弱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评价体系中的“含金量”;应重视同辈评价,将合作能力等难以被技术替代的维度,纳入评价的重要指标;应重视与学生交往中的评价,直接的交流互动不仅是对价值观主观评价维度的补充,还能维护良性的师生关系。其三,提升教育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能力。完善青

年价值观培育体系,教育者能力更新尤为关键。教育者应转变教育理念,不仅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表层”运用能力,更要以其为工具探索青年成长规律,如开展问卷调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功能,把握青年思想动态与行为模式,了解青年个性化需求与价值观“画像”,“知己知彼”地设计教育方案。此外,教育者也应适应新的角色定位,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积极“共存”,在主导“师—机—生”协同教育模式的前提下,逐步实现从知识传授向知识把关、从灌输指导向学习陪伴、从监督推动向技术合作的关系转变。

(四)激发主体自觉,提升青年的技术适应素养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青年价值观重塑的关键在于“主体自觉”。青年只有具备与智能时代相匹配的能力,才能更好适应技术变迁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升青年的技术适应素养,本质上是以“人的能力现代化”,充分“吸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生成抵御生成式人工智能伴生风险的根本力量。其一,增强青年自我内驱力。青年应主动洞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明确其输出结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并掌握技术运用的底层逻辑方法,在此基础上,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具体运用方式,并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防止技术滥用带来的价值消解。此外,传统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面对诸多没有“前车之鉴”的现实挑战,青年需要增强运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换言之,技术产品的历次迭代,都在倒逼青年直面技术“半衰”的挑战,这要求青年持续增强创新意识,树立技术驱动型的学习自觉,实现价值观的动态平衡发展,同时,要推动自身学习观念从“阶段式学习”向“持续式学习”过渡,并逐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其二,培养青年形成批判性思维。在技术浪潮下,树立批判性思维是青年保持价值观独立性的关键。一方面,青年应增强价值判断能力,这种“批判”并非“否定”,而是保持怀疑精神,不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保持理性思辨与批判性吸收,提升甄别虚假信息与自觉抵御不良价值观念的能力,还应保持对深度思考的持续渴望,以“质疑”刺激理性判断,进而作出明智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青年应树立正确的技术伦理观,不过度推崇技术的“拟人化”能力,应充分认识到,“当人把创造历史的自主性托付给了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技术,技术逻辑将全面深入地重塑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以及人的生存方式”^[35],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必然无法替代主流价值观教育,也无法促进青年价值的完全实现。其三,提升青年技术心理韧性。无论是“信息焦虑”还是“主体危机”,无疑都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无形中给青年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部分青年由此产生自我怀疑,甚至对人类未来产生消极悲观的态度取向。对此,必须提高青年在新兴技术面前的“抗压”能力,使其既要和技术变革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正视技术变革的必然性,并将其视为自身能力提升的契机而非威胁,又要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在技术浪潮中调整心理状态和发展方式,逐步找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可见,提升青年的技术心理韧性,有助于提升青年面对技术变革的承受力,有助于保持青年价值观的稳定性,避免因技术冲击带来的价值混乱甚至极端化倾向。

[参 考 文 献]

- [1][2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页。
- [3] 邱吉 杨秀婷:《网络新技术对青年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 [4][30] 陈文旭 温煜明:《人工智能与青年价值观塑造:机制、话语、风险与应对》,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 [5][10] 童建军 万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青年价值引领的价值审思》,载《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5期。
- [6] 单珣 王珏:《生成式人工智能交互中意识形态感性化认同的行为机制及其调制——以高易感性青年群体为例》,载《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
- [7][22] 孙立会 周亮:《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的主体性风险与规避——基于生成哲学的分析》,载《现代教育技术》,2024年第8期。
- [8][29] 闫瑞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与化解路径——基于教育对象主体性视角的考察》,载《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6期。
- [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 [11] 王思佳 张瑜:《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逻辑及矛盾调适——从ChatGPT到GPT-4o》,载《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2期。
- [12][28] 殷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 [13] 龙志勇 黄雯:《大模型时代》,北京:中译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 [15]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
- [17]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 [18] 汪康 吴学琴:《智能媒体时代青年价值观认同建构》,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
- [19] 刘志毅:《智能体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第200页。
- [20] 涂良川 高镁琪:《人工智能“对齐人机”的价值叙事》,载《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5期。
- [21] 谢波 曹亚男:《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探析》,载《国家安全研究》,2024年第1期。
- [23] 余胜泉 汪凡淙:《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认知外包陷阱及其跨越》,载《电化教育研究》,2023年第12期。
- [24] 丁玉峰 黄蓉生:《数字青年价值观“云”生成的现实透视、多重镜像与引导策略》,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 [26]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 [27] 杨雄:《青年与人工智能:认知态度与数字素养提升》,载《人民论坛》,2024年第11期。
- [31][3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4、41页。
- [33]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66页。
- [34] 吴河江 涂艳国:《超越工具理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价值》,载《教育研究》,2024年第11期。
- [35] 郭全中 张金熠:《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存在问题及伦理风险》,载《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 丹)